

〔法〕弗雷德里克·巴斯夏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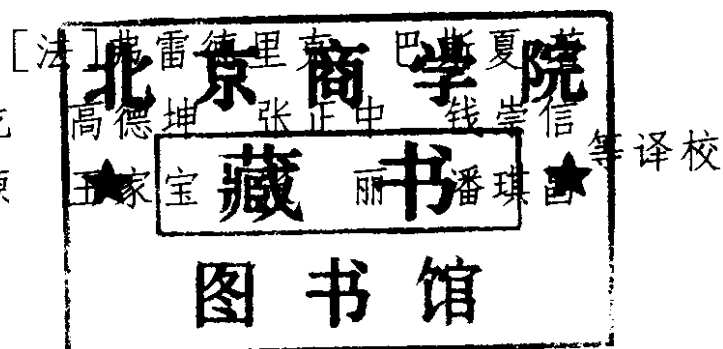
和谐经济论

西方现代思想丛书 2

F 03
85

和谐经济论

许明龙
陆伯源



09636150

-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9月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和谐经济论/(法)巴斯夏(Bastiat, C. F.) 著; 王家宝等译; 冯光元等校.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现代西方思想丛书; 2)

ISBN 7-5004-1834-5

I. 和… II. ①巴… ②王… III. 资本主义经济—经济理论—研究 IV. F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20695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市怀柔中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25 插页: 2

字数: 400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25.20 元

《西方现代思想》丛书之一

主 编 郭永才

副主编 季 野 马丽特

陶 涛 青 泯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坚勇 马丽特 冯兴元

李汉林 曲克敏 杨 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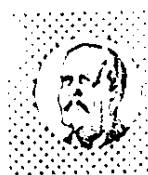
青 泯 周民德 季 野

郭永才 郭福平 柯汉民

陶 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
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组织翻译

德国弗里德里希·诺曼基金会
(**Friedrich—Naumann—Stiftung**)
提供资助



5x2 1/15

译者的话

弗雷德里克·巴斯夏，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生于1801年，卒于1850年；早年研究哲学、文学，后受亚当·斯密等人的影响，发表一系列宣传自由经济观点的著作，代表作是《和谐经济论》。

《和谐经济论》是时代的产物，它的问世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19世纪初，法兰西第一帝国虽然战胜了欧洲大陆国家，却屡屡不能制服英吉利海峡彼岸的英国。继在特拉法加海战中失利后，拿破仑一世改变策略，于1806年颁布《大陆封锁令》，翌年又推出《米兰法令》，禁止各国与英国进行贸易往来，企图从经济上扼杀对手。1814年，拿破仑帝国寿终正寝，波旁王朝复辟，颁布新宪法，称《1814年宪章》，承认“《民法典》以及与《宪章》不相违背的现存法律依旧有效”，继续对英国的封锁；1830年七月革命后，路易—菲利浦王朝萧规曹随，在对外贸易中依然执行关税保护政策，贸易保护主义得以继续存在。

然而，大陆封锁政策只是一时切断了英国与欧洲大陆的经济联系，暂时刺激了法国的工业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弊端日益暴露，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断了原料来源，影响产品出口，招致工商资产阶级的不满。特别是到了40年代，因受经济危机影响，工商、财政、政治、社会产生一系列问题，非但平民百姓陷入困境之中，怨声载道，就连中小资产阶级乃至大资产阶级亦深感不安，纷纷要求取消保护主义，推行自由贸易。1844年，巴斯夏响应英国反贸易保护主义——《谷物法》运动，在《经济学家杂志》上著文《法国和英国的关税对两国国民前途的影响》，猛烈抨击关税保护政策，主张自由贸易，赢得了资产阶级的喝采，从此声名鹊起，1855年他亲临美国，实地考察当地民众反对对进口谷物课以重税的斗争；翌年，美国废除《谷物

法》，他旋即返回法国组建自由贸易联合会，统辖全国有关的协会，嗣后创办《自由贸易周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不久发表集自由经济观点之大成的《和谐经济论》，被人誉为“经济史上自由贸易的最伟大的福音传教士。”

贸易保护主义系指利用关税、补贴或进口配额保护本国工农业的政策，如英国的《谷物法》、法国的“大陆封锁令”。巴斯夏认为保护主义完全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侵略行为，因而是一种破坏经济和谐的行径，正如自由经济的敌人封建贵族想靠劳动人民来养活自己一样，有些民族就是想通过保护主义来掠夺别人。为此大声疾呼自由贸易，指出只有人们不再认为可以强迫他人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时，世界上才会有永久的和平。巴斯夏关于自由贸易的主张生前未能实现，身后却倍受重视：1860年，拿破仑三世受自由经济影响，派巴斯夏的学生率团与英国签订《基于法英产品自由交换原则的贸易协定》，最终彻底打破了贸易保护主义，法国的资本主义得到长足的发展，始于世纪初的工业化到60年代的第二帝国时期终于完成，法兰西从此跨入了现代化国家的行列。然而，断言有了自由贸易就会有世界持久和平，这只是一种幼稚的想法。历史事实是：无论在保护主义时代还是自由贸易时期，只要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存在，就有战争，世界就不会安宁，这道理不说自明。

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说：“巴斯夏曾以波尔多和所有法国酿酒厂主的名义煽动反对现存的统治制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4页。）巴斯夏在政治上反对路易一菲力浦的金融寡头统治，七月革命胜利后，他抱着建立自由主义共和国的愿望入选议会。需要指出的是，与此同时，巴斯夏亦反对社会主义的兴起。众所周知，19世纪上半叶，特别是七月王朝建立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工人运动随之勃兴，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提出了种种政治、经济、社会改革方案，直接威胁着资产阶级统治。巴斯夏对此大加鞭挞，视社会主义

为封建落后的保守主义,在《和谐经济论》中强烈反对社会主义,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我们知道,从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到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直至布朗基的空想共产主义,虽然因时代的局限都是不成熟的社会主义,但当时毕竟代表着一种进步的思潮,巴斯夏对此大加反对,是为阶级立场所致。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日臻完善,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可是巴斯夏于1850年撒手人寰,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来不及作深入的了解,因此不可能对此有所评论。然而,他的学生伊夫·居约特、古斯塔夫·德·莫利纳里分别在《社会主义的暴政》(1893年)、《将来社会的政治经济组织》(1899年)中,把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一点应予说明。

巴斯夏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是在同封建主义思想的激烈斗争中逐渐形成的,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他的《和谐经济论》出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迭经出版,可见影响之深。然而,不管他的思想、观点如何,不论大家对此有何看法,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毕竟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维护的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无论提出怎样“和谐”的政治、经济理论,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诞生后,世界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时代不同了,无论是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都具有消极乃至反动的性质,成了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当然,这不等于说我们不要“自由”,恰恰相反,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全人类,给人以自由,只是这种自由和实现的途径有别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得十分明白:“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

今天,我们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对外改革开放,对内搞活经济。为了借鉴各国的经验,我们翻译了

这部在西方颇为流行的《和谐经济论》，介绍 19 世纪上半叶法国一种有代表性的经济理论，供广大读者研究、参考。

《和谐经济论》(第 6 版)选自《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全集》第 6 卷。该卷文章由吉约曼出版公司根据作者手稿整理、校注，于 1870 年在巴黎出版。原书中斜体字部分译成中文时均在下面标以横道；页码下除原有的作者注、编者注外，我们又酌情对某些史实、典故加了少量必要的译注；注释中所指的页码为法文版原书的页码。全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外交部和外交学院部分专家学者翻译，他们是：许明龙(《致法国青年》，第 1—4 章)、高德坤(第 5—6 章)、张正中(第 7—9 章)、钱崇信(第 10—11 章)、陆伯源(第 12—15 章)、王家宝(第 16—18 章)、张丽(第 19—25 章)、潘琪昌(导言)；许明龙校了部分译稿，王家宝负责通稿、编排译名对照表。另外，冯兴元、季野、青泯、日天等参加了部分章节的翻译和校订工作。译文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王家宝 1995. 8. 15

Frédéric Bastiat
HARMONIE ÉCONOMIQUE
Guillaume, Paris, 1870

根据巴黎吉约曼出版公司 1870 年版译出

目 录

导 言：	(1)
致法国青年	(34)
第 一 章 自然秩序和人为秩序	(49)
第 二 章 需要、努力、满足	(65)
第 三 章 人的需要	(77)
第 四 章 交换	(99)
第 五 章 价值论	(133)
第 六 章 财富	(181)
第 七 章 资本	(197)
第 八 章 产权与共同体	(217)
第 九 章 土地产权	(247)
第 十 章 竞争	(287)
第十一章 生产者与消费者	(317)
第十二章 两句格言	(332)
第十三章 论收益	(340)
第十四章 论工资	(346)
第十五章 论储蓄	(388)
第十六章 论人口	(398)
第十七章 私人劳务、公共劳务	(417)
第十八章 动乱原因	(437)
第十九章 战争	(445)
第二十章 责任	(455)

第二十一章 连带责任 (477)

第二十二章 社会动力 (483)

第二十三章 邪恶 (492)

第二十四章 可完善性 (495)

第二十五章 政治经济学与道德、政治、立法、
宗教的关系 (500)

译名对照表 (504)

导 · 言

德特马·多林^①

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宣告人：
弗雷德里克·巴斯夏

—

在学术界，声誉可能是一件难以判断之事。在他处明明是优点，在此处却可能常表现为缺点。弗雷德里克·巴斯夏死后的荣誉就是这样一例明证。几乎每一个写他的人都情不自禁地证明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修辞和政论天才，伟大的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瑟斯 1927 年在其《自由主义》一书中谈到，巴斯夏是一位“光彩照人的修辞学家”，“读他的著作是一种特殊的享受。”^② 巴斯夏的同胞约瑟夫·熊彼特则将他看作是有史以来最出色的经济记者。^③事实上，在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事业上，几乎找不出一个文字上比他更

① 德特马·多林，1957 年生，哲学博士，系位于柯尼希斯维特的德国弗里德里希——诺曼基金会研究人员。

②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主义》，由 H·H·霍佩 写导言，圣·奥古斯丁，1993 年，第 171 页。

③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纽约，1954 年，第 500 页。

强有力的代言人了。他时而带着一种几乎令人想起伏尔泰的讽刺,时而充满了几近狂热的虔诚,但始终含有一种明晰的、理性的逻辑。巴斯夏就是这样地来捍卫他所深切关心的事业,以至当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圭多·德·鲁杰罗在1930年居然忍心说巴斯夏的著作“枯燥无味”时^①,人们无不对此惊讶不已。

诚然,实际上绝不枯燥的新闻风格的确也会带来倒霉的后果——即被人论为肤浅。本来是长处,在将艰涩难懂的表达方式奉为真正“学术味”的学术界,却变成了短处。至少它使学术界有了很好的借口,根本不去同自己不喜欢的见解争论。^②只是由于少数几位忠于巴斯夏及其遗产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的努力,巴斯夏才得以恢复他被长久貶误了的、严肃经济学家的名誉。

二

为了能判断巴斯夏作为19世纪一位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的作用,有必要先把眼光从巴斯夏的出生地法国移开而转向英国。

1836年,一场来势凶猛的物价上涨浪潮遍及英国。接踵而来的是失业,随后又发生了扰乱社会治安的暴力行为,出现了群众性的贫困化。1845年,爱尔兰的危机上升为一场饥荒。这场饥荒延续了许多年,单是在1847年的冬天就饿死了250000人。有人将其原因归咎于几次坏收成。然而真正的原因要比这深刻得多,它是政治性的。当时不能通过廉价的进口来弥补歉收的不足,恰恰相反:国内本已短缺的粮食甚至被用来出口。其罪魁便是保护主义的《谷物法》。该法对外国粮食征收高关税,而对国内粮食的出口却给予国家补贴。这个法令

① 圭多·德·鲁杰罗:《欧洲的自由主义史》慕尼黑,1930年,第178页。

② 米瑟斯在写到反对巴斯夏的事件时不无正确地写道(见上注书):“他对所有保护主义的以及与此相关的做法所作的批判即使在今天也是无人可超越的。保护关税者以及干预主义者说不出一句像样的话来回答,他们只能一再结结巴巴地说:巴斯夏‘肤浅’”。

源于 17 世纪重商主义时代。当时人们普遍相信,这样的措施能作为刺激出口的手段而促进生产的增长。亚当·斯密早在 1776 年他的《国富论》一书中就警告过,在收成不好的年景,对出口实行国家补贴会使短缺情况变得更加严重。^① 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即那位后来有名得多的自由派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父亲,在 1805 年写了一篇专门研究《谷物法》的灾难性后果的论文。单是这篇论文冗长的题目——“论对谷物出口补贴的失策”——就表明,文章的批评仍然主要局限在学术范围内,更为糟糕的是,那时的经济学家们都沉浸在一片绝望的悲观情绪之中。历史的经验似乎证明他们是对的。因为在他们生存的整个年代里,绝大多数人赤贫或大批地饿死乃是普遍现象。即使在相当繁荣的英国,连最具真知灼见的思想家也不相信这个问题能真正得到解决。埃德蒙·伯克,这位伟大的作家和辉格党国会议员,在 1795 年认定:“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人数众多。他们的人数意味着他们天生受穷。”^② 他又写道:“给我们提供必需的东西,这并不在政府的权限之内。”^③ 而伟大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在他 1798 年发表的著作《论人口原理》中认为,完全是人口增长带来了严重的贫困化,只有通过有力的节制生育的政治措施才能稍稍减轻这种贫困化现象。他的同胞大卫·李嘉图由此在 1817 年提出了“铁的工资定律”,这一定律声称,劳动阶层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是不可能的。

这样一种悲观主义当然不会不产生后果。人们很少去作政治上的鼓动,以至国会中的托利党人能够在 1815 年颁布了更加严厉的

① 亚当·斯密:《国富论》,两卷本,伊·坎南编,G·施蒂格勒作序,芝加哥,1976 年,第 2 卷,第 12 页。斯密认为,所谓有益的补贴是有害的——尤其是对比较穷困的阶层人士来说——其有害程度甚于任何一种对生活必须品的沉重课税。

② 埃德蒙·伯克:《关于短缺的思考和细节》载:《文集》,原 1887 年伦敦版的再版,共分 6 卷 12 部分,希尔德斯海姆,1975 年,第 5 卷,第 133 页。

③ 同上注。

《谷物法》。其后果后来就越来越清楚了。狄更斯在他的小说中清楚地向我们展示的那种 18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黑暗的苦难岁月，不是像流行的历史观所记述那样是自由主义和工业革命的产物，它们是一种过时的封建政治的产物，而这种政治已经不再能应付正在兴起的现代群体社会的挑战。

三

1840 年，在这个阴暗的世界上爆发了一场运动。推动这场运动的人是约翰·布赖特。他是一位企业家，自 1847 年起为曼彻斯特国会议员。还有一位叫里查德·科布登，是来自曼彻斯特的印花厂主。他们两人与当时英国中部这个蒸蒸日上的工业城市的密切联系，使这场运动冠上了“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名称。曼彻斯特自由主义在以后的历史著述中受到轻慢。这些历史著述毫无批判地接受了 19 世纪晚期保守党人的宣传，声称这一自由主义思想来自资产阶级资本家阶层，而且只是为了这个阶层服务的。还声称它对无产阶级的贫困和离乡背井负有责任。这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

当科布登和布赖特在 1840 年将当时松散的、地区性的自由协会组织起来，使其成为一个极为有效的全国性联盟，即“反谷物法联盟”时，一场深深扎根于工人阶级的群众性运动也就同时掀起了。实际上，这场运动后来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靠了英国政治阶级的支持，而是更多地靠了“外来的”民众造成的舆论压力。在 1832 年的体现自由主义思想的《改革法案》之后，选举权扩大到较为广大的阶层，这对此帮了很大的忙。

科布登以他不知疲倦的努力，并在耗费了大量的财力后——他单在 1844 年就募集到了 100000 英镑，这在当时是一笔巨额数字，尽管当时许多工业主都正站在保护主义者一边——在布赖特的支持下，成功地建成了一套迄今尚不知其有多大规模的、富有创造性的宣

传机器。他们散发了 900 多万本对人民进行启蒙的小册子，在全岛国举办了无数次活动，其中有一种是在伦敦考文特花园举行的每周一次的群众集会。还在曼彻斯特建立了一个巨大的自由贸易大厅。来自各阶层人民的申请书雪片似地飞向国会——1842 年有 2880 份申请书，总共 150 多万人在上面签了名。受到这场运动冲击的不仅有对自由贸易原则基本上持开放态度的自由派辉格党人和极端主义者，甚至执政的托利党人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也转变了思想，终于，保守的首相罗伯特·皮尔先生采取了决定性的政治步骤。他在 1846 年取消了《谷物法》，科布登和布赖特取得了他们首次伟大的胜利。^① 苦难结束了，一个迄今人们所不熟悉的繁荣的时代开始了。

自此以后，事情就接二连三地进行下去。皮尔因其“背叛”了托利党的封建保护主义原则而被自己的、如今群聚在本杰明·迪斯雷利周围的党友推翻。在拉塞尔勋爵领导下的新的自由派辉格党政府在 1849 年取消了 1651 年的《航海法》，从而解放了英国的海上交通。其他的措施也跟上来了。自由贸易商终于在 1860 年敢于涉足外交事务，同法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以《科布登条约》之名载入了史册。协订单从英国方面就取消了 371 种关税，从而使曼彻斯特自由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一个低关税和边界开放的欧洲开始形成。

四

法国卷入了科布登和布赖特发动的曼彻斯特运动，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反《谷物法》也启示了英国之外的人们。不久以后，几乎每个欧洲国家都出现了自由贸易运动，在意大利，声誉很高的《经济

^① 对反《谷物法》运动的最透切的描述见于约翰·莫利斯写的科布登传记。莫利斯本人属于 19 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时代最重要的作家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关于反《谷物法》的斗争见约翰·莫利斯：《理查德·科布登生平》，伦敦，爱丁堡，都柏林，纽约，第 95 页以下。